



【文化杂谈】

保温杯、许知远 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唐小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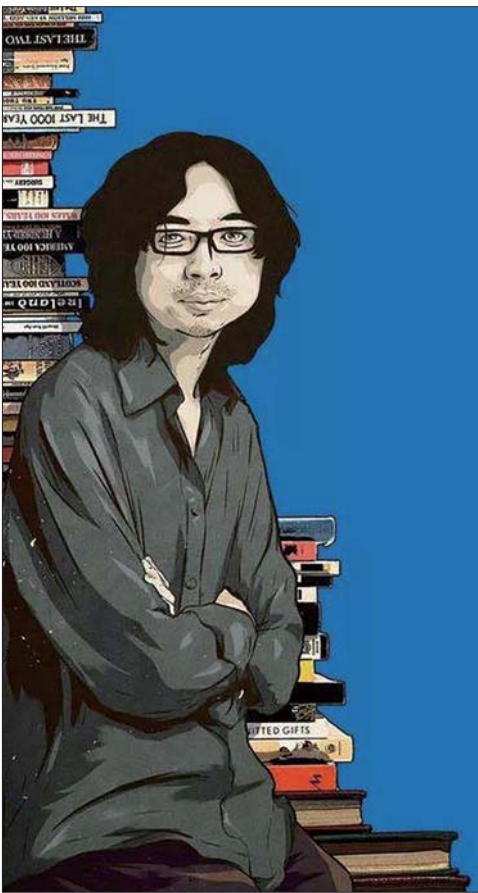
从对手持泡枸杞的保温杯的“中年人”的调侃嘲讽,到新近这一轮对于70后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许知远的网络狂欢式的攻击与谩骂,形成了这段时间最令人瞩目的一种以年龄和视野为划分人群标准的社会文化现象。简而言之,无论是中年危机的自我表露,还是对于危机中的中年人的冷嘲热讽,都折射出一种基于年龄、身体以及由此而来的攫取新资讯、信息以及对于这个时代最流行的社会文化议题的代入能力的优势,对于身处中年而身体与心灵貌似都处于疲软、凝固和刻板态势的一代人的“青春优越感”。

那么,青春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仅仅是自然年龄的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展示吗?还是意味着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状况与体制有一种内在的批判性视野,并且这种批判性同时也指向对自我的深度反省?青春仅仅是跟流行文化衔接紧密的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荷尔蒙分泌吗?就像双双崩盘的青春偶像的两端韩寒与郭敬明现象所隐喻的那样?

无论是清末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还是五四新文化酝酿而出的新青年,或者之后的革命青年,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在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进化论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一种民族国家危机时刻的青春崇拜症。青春既是李大钊的名篇《青春》所热烈歌颂而被寄予厚望的存在,他及那一代追求进步的知识人认为要想青春之中华降临华夏就必须让老人和中年人退出历史舞台,给青年人腾挪出社会文化和政治表达空间,新旧之间势不两立。政党领导的革命尤其注重发掘青年人所蕴藏的巨大政治能量,掌控新式报刊和文化资本的知识精英也特别注重吸纳具有社会改造理想的文学青年加盟其中。这就从晚清民国开始形成了一种极为强烈的青年崇拜现象,也就是社会学家陈映芳教授在《“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中所解析的那样,青年被赋予了一种巨大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使命,负荷了也许不该承担的社会角色。这对于崇尚经验与积累也因此尊奉老者的中国文化传统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逆转,也就意味着在青年与中年人之间,发生了一种朝向未来而割裂过去的“权势转移”,在这种进步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的论述之下,青年人嘲弄中年人,中年人挖苦老年人,就形成了一种在代际之间的类似于人类学家王明珂所分析的“一截骂一截”现象。但请注意,青春文化既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对于具有极大的社会改造能量甚至破坏力的青年群体,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中,社会各界特别注重防范、规训乃至吸纳,正如已故台湾学者黄金麟的分析所展现的那样,对身体的管控与规训是新政治文化最重要的一环,而这种规训毫无疑问也会培养一种顺服甚至依赖于体制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回到保温杯与许知远这个话

题上来,就会发现这本来是两个并不相关甚至相反的存在,却悖论般被扭合在几乎同一个时代刷爆公共议题。保温杯所隐喻的是“苟利身体生死以”的养生主义,折射出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乃至一种温吞吞状态。而许知远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最不合时宜的人之一,他身上弥漫着强烈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在20世



纪反精英主义的革命文化的映照之下也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而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将自身安置在精神舒适区的伪贵族,他是一个对这个时代充满不满、愤怒和不屑的人文主义者(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对于过去失落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情趣有一种怀旧的迷恋),他貌似从来没想过在与这个时代和解的假面舞会中实现对自己的宽恕与接纳,因此在公众视野之中,他就成了一个长不大的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的“任性的孩子”。这种不合时宜的文化和道德形象在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中曾经是被热烈肯定的一种状态,也正合乎萨义德对知识分子应该是永远的边缘人、不合时宜的批判者和业余写作者状态的定义。然而,在公共空间急剧窄化和公共文化迅速衰落的当下,与之相链接的文化形象和知识者态度,都成为被这个时代的主流人群(包括价值观的主流和号称代表青年的主流)解构的对象。

何谓真正的青春意识?青春注定是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捆绑在一起的吗?青春仅仅是一种力的社会存在吗?还是说青春同时也应该容纳多元、反省、开放与世界主义的视野?在我看来,将青春简单地界定为代际更替呈现出的后发优势以及在媒体更替中出现的年龄优势和新媒体运用能力,是一种最简化、最方便但也最可笑的方式。

一个八十岁的身体里,极可

能蕴藏着一颗十八岁的灵魂;而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却很可能具有垂垂老矣因循守旧的心态。我记得二十年前读过一篇五四新文化作家梁遇春谈“天真”这个话题的散文,大意是赞美儿童的天真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儿童少不更事,天真烂漫就如混沌未开,如蒋方舟所言“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只能说是一种未经检验的自然天性。而一个中年人,在历经了许多人间沧桑甚至苦难之后,仍旧对于梦想、正义、平等、未来和人心怀抱着一一种谨慎乐观的期待,在待人接物之中有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自然心态,仍旧对人间一切美好而良善的存在怀抱着一一种浪漫主义的激情,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天真”。即使被这个世界伤害得遍体鳞伤,仍旧无怨无悔地如阿伦特所言介入这个世界,去积极地行动,去友善地关切,去试图改变,去爱这个世界,在内心里没有怨恨,也没有高高在上的道德和知识优越感。换言之,这样一个人在情感经验上能够与这个世界保持感通的状态,如鲁迅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是与己相关的。在逻辑上能够认知自我的局限并保持一种对于新知和新视野的汲取能力。这或许才是一种真正的“青春精神”。

写到这里我就想起自己跟好些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位美国学者托尼·朱特。朱特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之一,留下了《战后欧洲史》《责任的重负》《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未竟的往昔:1944-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沉疴遍地》等杰出作品,在患上罕见疾病渐冻人症几乎无任何行动能力之后,还留下与朋友斯奈德对谈和反思20世纪历史与政治的经典《思虑20世纪》。这本最后的对谈集所展现的思考视野,反省力度、历史认知和道德关切,在我看来所彰显的恰恰是一种当代中国知识界和社会最需要的“思想青春”。

钱理群教授2002年从北大退休之后,写出了《我的精神自传》《岁月沧桑》等一系列卓越的著作。我两次到北京昌平他的寓所聊天对谈,感觉到的完全不是一位年近八十垂垂老矣的学者的面貌,而是一种对研究、反思与重现20世纪中国历史充满了一种理想激情的“思想青春者”,这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更代表了一种“青春的状态”,也就是一种在切实的历史视野与现实关切之中,将自我的感性生命存在与学术写作内在融合的一种饱满、深刻而具有力度的精神状态。正如作家陈冠中所言,在这个沉疴遍地狼烟四起的世界,能够活出时代的矛盾,将所有的毒药转化成养料,并孜孜不倦地追求自我的心灵建设知识与知识视野更新的人,就是一种真正的青春状态。

(本文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读书有道】

经典难读？只是缺少方法

□韩少功

现在很多青年觉得经典作品难读、不好读。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得避免自己被流行文化快餐败坏口味,可能还要注意一些方法。

现场还原。经典大多是前人的作品,总是呈现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与当下读者有经验隔膜。要克服这种隔膜,需要我们发挥一点想象力,设身处地,知人论世,在阅读时尽可能还原当时的现场,减少进入作品的障碍。比如,眼下活在都市的人,习惯于使用煤气和电磁炉,从没烧过秸秆和柴火,对“人烟”这个词可能不会有少感觉。他们从未经历过乡村生活和农业文明,一看到冒“烟”,那还不打119报警?当代人习惯于手机视频通话,大概也不容易对长相思、长相忆、长相恋这一类苦情找到感觉,不容易对渡口、远帆、归雁、家书这一类意象怦然心动。还有文学手法的差异也是这样。我曾说过,汉赋作家们为何那样喜欢白描铺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为什么那样喜欢写静物,写个街道或修道院,一写就好几页?他们这样写是不是太啰唆?要知道,那时候他们没有电视,汉代人更没有照相机,作家是让人们了解异域世界的主要责任人。他们不那样“啰唆”,不那样详细报告,读者可能还不答应,还不满足。他们那样写的合理性,只有放到当时的现场里,才能被我们理解。

心智对接。作为现代人,我们不必以为自己有了飞机和电脑,就在一切方面都远超前人。其实,财富、科技是可积累的,是直线进步的,而在道德、智慧等方面却未必。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聚焦于女性地位:一个不愿成为男人“玩偶”的新女性,如何打破自己的婚姻困境。鲁迅后来写过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继续讨论这一话题。现在时间过去了一两百年,那个时代早已翻篇,但易卜生、鲁迅所说的问题解决了吗?看看时下的电视剧,有多少个新款“娜拉”还在那里哭哭啼啼、叫叫喊喊,一言不合就出走,不是去西藏就是去海南——生活在远方嘛。据近期公布的数据,全国一年之内有五百多万例离婚案,涉及一千多万人,如果以十年计,就是一亿多人。这里面自觉悲愤、深感茫然的“娜拉”何止千万!不难看出,不管生活在什么时代,不论财富和科技积累到什么程度,人的生老病死、恩怨情仇、穷达沉浮,都面临一些长久甚至永恒的难题。前人和我们差不多是同一张试卷面前的考生。那么,如果说读经典有意义的话,无非是这些作品提供了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能给我们帮助。

多元互补。经典并非绝对真理,并非万能和终极,而且各有局限与缺失。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好而知其短”,不要相信一个药方可以包治百病,可以包打天下。一个小学生,没有恋爱经历,读《红楼梦》肯定是不合适的;一个初入职场的青年,最需要立志,打拼奋斗是第一要务,你给他讲《六祖坛经》,说有就是无,得就是失,打拼就是不打拼,赚钱就是不赚钱,肯定是坑人;一个读书人如果没把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马克思的底子打好,缺乏坚实的理性和逻辑训练,一上来就“后现代”,天天玩“解构”,肯定也只能把自己给废了。事实上,经典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是多元互补的百味良药,但切切不可乱用——使用时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因条件、因任务目标,组成不同的阅读配方,产生最好的组合效应,否则就无异于东施效颦,甚至是谋财害命。

以行求知。有些外国批评家赞扬中国当代文学,常用“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马尔克斯”这一类概念,倒是让当事的一些作家不高兴。为什么?因为当一个复制品说不上有多光荣、有多大出息。古人早就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只有超越老师,做好自己,有所发明和创造,才是对经典最好的致敬和学习。阅读经典同样如此。读经典不是复制知识。饱读诗书如果只是读成个书呆子,读成一部留声机,就不如不读。读书、上课、拿文凭充其量只是一种“半教育”,只有读懂了人生与社会这本“大书”,在生活中尝过酸甜苦辣,才有一个教育过程的相对完整,才能使知识进入我们的血肉,成为真正可靠、可用的滋养与财富。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孔昕
美编:马晓迪